

# 论日本“一党独大”视域下政治体制的民主运行

## ——以“1955年体制”为例

李京

(北京大学, 北京 100087)

**[作者简介]**李京(1988-),女,陕西汉中,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现代化理论与实践。

**[摘要]**日本自民党从1955年起,单独的一党执政长达38年之久。此间日本的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取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从战后的满目凋敝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强国,自民党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透视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体制”的成因与特征,分析自民党历经议会内外的各种“反体制运动”,可以发现自民党党内充分健全的民主制度是其能够长期执政的重要保障,党内各派竞争是其走向成熟民主不可替代性的过渡阶段。因此,反观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解体和崩溃最终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充分体现出日本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性巨大进步。

**[关键词]**日本自民党;民主体制;“1955年体制”;反体制运动

**[中图分类号]**D6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2)04-0091-06

1945年战败投降后的日本一片凋零破败,经过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一跃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70年代日本经济又转入稳定增长。经济实力增强后,日本从80年代又开始由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目标迈进。战后日本在现代化历程中,曾出现过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掌权柄长达38年之久,但最终终于失去执政权,从此日本政坛走向了政党轮流执政的民主政治新阶段。全面解析日本自民党自1955年开始的“一党独大体制”的特征、成因及体制的崩溃,对于全面正确认识政党政治在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重要意义。

### 一、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产生和发展

战后日本在美国主持下制定了1946年新宪法。《日本国宪法》根据“国民主权”原则实行“议会内阁制”,建构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从制度上确立了美国式的民主框架,形成政党竞争、公民投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地方自治、

保护个人权利等宪政民主要素,这也刺激和推动了战后日本政治民主化浪潮的兴起。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日本协同党形成了日本的保守党体系,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构成了日本革新党体系。

经过战后新宪法框架下的几次选举,革新派的力量逐渐强大,议席数不断增多。特别是1954年大选后,保守派政党席位下降,革新派的左右两翼社会党席位有所增加,正好达到156席,占议席总数467席的三分之一,达到了阻止修宪的最低条件。1954年1月,左翼社会党通过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日本形态”为目标的左派社会党纲领,让日本财界感到不安。革新派势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日本财界的高度重视,使正在构筑全球冷战战略的美国也十分警觉,各方面都迫切希望日本的保守派势力尽快地联合起来,构建一个持续稳定的保守政权,保守势力的联合已是迫在眉睫。对此,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快速地做出了回应,1954年10月做出了“迅速实现保守联合”<sup>[1](P1005)</sup>的

决议。到了1955年10月,革新势力中分裂为左右两派的社会党在党内率先实现了统一,客观形势的发展也要求保守党各派必须尽快解决合并问题。自由党与民主党在经过紧急磋商后,就党首和内阁问题达成一致。11月自民党成立,在众议院拥有299个席位、参议院拥有118个席位,一跃成为日本第一大党。

由于自民党的成立,国会中占有议席的政党数目大大减少,其中的“社会党和自民党占据了国会议席的97%”<sup>[2](P17)</sup>。当时,社会党虽占据约三分之一的议席,但仅相当于自民党议席的二分之一,两党相比差距很大,国会中很难出现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此后自民党长期保持占有多数的局面,直到1993年下台,执政长达38年之久。自民党在议会中长期一党独大,执掌权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由于这一体制产生于1955年,又被称为“1955年体制”。因为这种体制的特点是自民党一党独大,也特指“一党独大体制”。

自民党通过党内派系竞争保持了38年的执政期,而最终还是失去政权,这一历史过程再次说明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过去执政不等于未来执政,今天掌权不等于明天掌权。一时的强权抵不过现代化的历史规律,独裁必然走向民主,不健全的民主必然走向充分民主。

## 二、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政治特征

1955年,日本政党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党派林立、多党纷争的政治局面被几个大党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所代替,其中自民党和社会党两派占据了国会80%以上的议席,自民党的席位超过社会党席位的1倍以上,并且始终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开启了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的历史。这样一种体制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也不同于美国、英国的两党制,又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党专制”。它是日本在特定环境下的一种特殊政治产物,凸显出这样几个重要的政治特征:

1.“一党独大”、多党竞争。“1955年体制”根植于《日本国宪法》这一宪政民主体制中,任何政治力量要想获得国家政权都不可能撇开新宪法预设的程序和规则,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内展开博弈,去争取权力和获得权利。自民党众议院议席在1976年(249席)、1979年(249席)、1983年(250席)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都保持在270席以上,占众议院半数以上的绝对优势。这种政党制度是“一党独大”,即“一党”主政,而非“一党专制”、“一党独裁”。在当代政治学中,它与两党制、多党制一样,通称为民主制度。

战后日本的政党制度中,在允许多个政党合法存在并参与竞争的前提下,自民党能够长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这与“东亚其他国家这一时期的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有着质的差异。”<sup>[3](P38)</sup>日本的政党体制是基于在野党不受压制、公平竞争基础之上,在野党对执政党构成很大的压力,并享有政党的基本权利,只不过在选举中未能上台执政罢了。在自民党“一党独大”期间,“日本共举行了12次大选,自民党共有9次赢得过半数议席,3次取得近半数议席”<sup>[4](P75)</sup>,这说明自民党均是在宪政民主体制内,通过合法程序和途径获得并保持了执政党的地位。尽管自民党“一党独大”长期执政,但始终是依法“竞争上岗”,拥有执政的“合法性”。

日本围绕政权的竞争,保守政党与革新政党之间展开了长期的对立和斗争。以社会党为首的革新政党曾几度形成与自民党抗衡的政治局面,但自民党每次都把这种危机化于无形之中,形成了自民党“一党独大”与社会党“万年在野”的状态。20世纪80年代形成发展起来的中道政党有公明党、民社党,也始终没有机会问鼎政权。因此,日本政坛才呈现出自民党“一党独大”与大小在野党并立的局面。这种对立与竞争,使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在体制内和制度外都受到有效的限制,并促使自民党在政策制定上必须要做出理性的选择。同时也使战后日本社会得到有效的民主动员,保证了日本在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下始终能够保持和平、民主的发展势头。

2.党内有派、党中有党。按照日本宪法规定,政府总理一般由国会中议席占多数的政党领袖出任,当选党首当然就是政府首脑。自民党允许党内有派,党内政治家通过建立自己的派别,在竞争中取得党的最高权力,进而实现就任政府首脑的目的。各个派系在党内虽然是非正式组织,但在实际运行中都已经相当组织化和制度化,各派系都有自己的办事处、会计、执行机关和政策研究机构,各种利益协调、人事安排、资金收集等都是以派系为单位进行。各派系之间、各派系与总裁之间都形成了相互牵引和制衡的关系。

在日本政治生活中,党内的这些派系各自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保守势力,他们在执政理念、施政纲领上都存在差异和斗争。但是这些斗争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能够保证拥有相对稳定的民众支持,使自民党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而党内不同派系的政治差异,恰好可以顺应不同时期政治环境和选民诉求的需要,有利于政党目标的多元化和覆盖面。当来自下层的压力较大时,由比较平民化的派

系掌权则可能使自民党得到更多下层民众的支持;当发展经济的压力较大时,与工商界联系密切的派系掌权就可以得到更多的工商界支持,使政策的推动更为有力;如果个人与自己派系产生了一定的分歧,也可以转入其他派系,从而化解派系内部的矛盾。

自民党内各个派系就像党内不同的子政党,政权由一个派系转到另一个派系,起到类似党内“政权交替”,对外又保持了自民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派系竞争虽然带有金钱政治、无谓权力斗争等种种弊端,但派系间的抗衡和联合,使自民党内部不但拥有一定的活力,而且具有自调节机制,从一定程度上讲,这种派系结构起到了防止组织过于僵化、过度凝固的作用,制度化的派系抗争才使日本政治变得更为开放、更具竞争性。

3. 自民党与官僚、财界之间形成难以割舍的利益链条和关系。在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中,政界、官界、财界三者紧密联系又相互制约。他们都具有共同“保守”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在政策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在日本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实际执掌牛耳的是行政部门中掌管事务的官僚们。这是一批素质高、责任心强,具有丰富行政经验和专门知识的精英群体,日本民众对这个官僚群体的认同感较强。自民党吸收高级官僚入党,不仅是为了扩大党的势力,更重要的是让高级官僚成为自民党政治的支撑力量。对于官僚体系中身居高位的官员们而言,寻求政治生命的新高度无疑就是进入政党组织,这样才能为自己日后政治发展打开上升空间。而自民党与官僚的结合,也能获得更强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

财界由多重组织构成,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同友会(同友会)、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日本商工会议所(日商),通常称为“财界四团体”。日本财界向政党提供政治献金是合法的。由于自民党与财界之间的相互利用、各有所需,一方面自民党通过财界获得了大量的政治资金,为自民党的政治活动尤其是政党的选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财界除了对自民党进行资金的支持之外,对自民党的选票也有相当的贡献,例如自民党的“票田”主要集中在农村。在农村人口不断迁入城市过程中,将某些企业或企业集团的选票分派给党内的议员候选人,这些企业或企业集团负责人就要承担议员候选人一定数额的选票,如果完不成任务,企业负责人将会失去自民党的支持。另一方面,财界对自民党的支持也附着着自身的利益要求,大企业要求政府制定有利于产业

发展的方针政策,中小企业则多着眼于补助金、许可证和贷款等更为具体的利益。据统计在日本立法中,“有80%以上是经济领域的”<sup>[2](P90)</sup>。这些法令大多出自高级官僚之手,财界需要通过这些高级官僚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官僚们在制定政策时,常常需要具有大量情报信息的财界的大力协助。同时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更需要财界的密切配合。当官僚们升迁无望,需要另谋职业时,财界还可以为他们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岗位。总之,自民党、官僚和财界三方相互扶持、各取所需,形成了难以割舍的利益链条和关系。

4. 自民党各派具有共同保守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自民党信奉保守主义政治哲学,认为保守主义精神就是保持优良的传统和秩序。其政治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天皇主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秩序主义”<sup>[5](P252)</sup>。在这种政治理念影响下,战后形成的日本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主要体现在“国家主导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序发展”<sup>[5](P26)</sup>。20世纪60年代末,代表保守路线的自民党放弃原有单一保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转变为实用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理念。日本社会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趋于保守,虽然承认现存制度存在弊端和问题,但他们更害怕社会动荡,希望通过改良和政党轮流执政来解决问题,不希望进行“反制度”方式的变革。选举中选民优先考虑的是执政策略能否维持自身利益,是否有益于自身发展。因此,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执政理念才能赢得民众支持,进而扩大社会和权力基础。

自民党始终把握经济优先的政策,利用其长期执政的巨大优势及手中所掌握的公权力,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调整传统的产业结构,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确立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保持经济全面协调稳步的发展。进而维护社会的整体与长远利益,来赢得国民的支持,达到巩固政权,稳定执政地位的目的。自民党这种“实用主义”的执政理念,具有较强的务实性、灵活性,既能牢牢稳住自己原有的支持群体,又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面前不断有所作为,赢得新的支持群体。自民党在执掌政权中、坚持保守的执政理念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本和砝码,使自身的发展也越来越强大,执政地位自然也就愈来愈巩固。

### 三、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时期日本各方的“反体制”运动

所谓“反体制”运动是指自民党“一党独大”期间,自民党内部反主流势力对主流势力的不断挑战和冲击以及日本议会内外激烈反对和试图冲破自

民党统治的各种社会运动。

随着日本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主政治的不断成熟,“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优势并不能十分有效地容纳各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参与,进而使“反体制”运动的对立和斗争不断出现并朝着更深层次的发展。正因如此,“反体制”社会运动的不断演进也大大推动了日本政治现代化发展。

### 1. 自民党内部的“反体制”运动

自民党是战后各保守势力通过“大团结”形成的,不同的保守派别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差距。派系的抗争常常表现为“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之间疑似朝野的对立,自民党内通过对党内主导权的竞争,“主流派”成为党内执政党,反主流的派别成为党内“在野”<sup>[6](P266)</sup>。1958年第二次组阁的岸信介内阁,一改之前的“低姿态”变得十分强硬。10月,岸信介内阁突然向第30届临时国会提交了《警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1948年制定的《警官职务执行法》从战后民主化的角度出发,优先保障国民的自由和人权,对警察的职务做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此次修改的重点是“从保护个人生命、财产改为维护公共安全与秩序,目的是扩大警察镇压群众运动的权限”<sup>[1](P116)</sup>。自民党提出该法案及其强硬态度,目的是使社会党措手不及,没有时间唤起舆论响应,迫使其接受。但适得其反,自民党的强硬态度反而使社会党更加团结。他们也表示只要政府不撤销该法案,不进行对话,就拒绝一切审议事项。以社会党和“总评”两方面为中心的65个团体组成“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随后在44个都道府县相继建立了反对“警职法”的共同组织。“反对修改警职法国民会议”连续组织全国统一行动,开展集会、游行和罢工等活动。反对修改“警职法”的群众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在各界强烈的谴责声中自民党仍然一意孤行,使得“岸信内阁”陷入困境。于是自民党内反主流派开始着手倒阁。时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的三木武夫作为反主流派代表与岸信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松村等人也反对自民党的做法,建议与社会党坐下来谈判;鸠山、石桥等人也劝告岸信介尽早摆脱困境,稳定局势。四面楚歌的岸信介此时才被迫同意暂缓修改“警职法”,以“审议未完”收场。这件事使自民党内派系斗争加剧,要求追究岸信介的责任、刷新党政领导机构的呼声高涨起来。1958年12月27日,反主流派阁僚池田勇人(国务大臣)、三木武夫(经济企划厅长)和滩尾弘吉(文部大臣)提出辞呈,挂冠而去,成立了反主流联合俱乐部——“刷新恳谈会”,要求刷新自民党的人事,使得党内抗争由此趋于表面化。在反主流

派的强大攻势下,岸信介不得不于1959年1月对内阁进行改组。反主流派对主流派的挑战,使在朝的主流派必须随时对自身政策方针做出明智选择,稍有不慎,就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稳固。

1960年第二届池田内阁时期,表面上看,池田政权得到了社会舆论和党内的支持,而事实上党内已经出现了批判池田的动向。岸信介派和佐藤派都批评池田的“低姿态”是无原则的一味讨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内阁任政调会长的福田赳夫也公开批判池田内阁的高速增长政策。池田对福田公开反对内阁重要政策的做法十分不满,于是就换掉福田。失去政调会长职务的福田纠集上百名各派中坚议员组成“党风刷新恳谈会”,继续批判池田,要求解散派阀。然而,1962年的总裁选举中,池田的政策还是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池田仍以绝对优势继续当选。在民主制度下,无论派阀之间的斗争如何激烈复杂,最终还是要通过民主的制度形式,以竞争的方式决定权力的最终归属。

1978年12月大平内阁成立。次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自民党只获得248席,远远不够过半数,创历史最低纪录,加上无党派的14席,才勉强过半数”<sup>[1](P220)</sup>。由此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又趋激化,福田、三木、中曾根三派都要求大平下台。因为福田和三木都是在总裁预选或大选失败后下台的。为了与大平对抗,反主流的三派成立了“自民党改进会”总会,准备对主流派进行瓦解,反主流派共同推举福田为首相候选人。大平自信在党议员总会上投票,他能够取胜,主流派由党的执行部召开了议员总会,也推举大平为首相候选人。这次,自民党历史上第一次推出了两名首相候选人。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众议院经过两轮投票,结果都是大平获胜。

综上所述,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抗衡斗争始终贯穿于整个自民党发展的全过程,不断地反体制运动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洞悉其“一党独大”的竞争性,并非是一潭死水,也具有民主制度的特性,只不过这是不成熟的民主,并非完全充分的民主。正因为如此,这种体制内的“反体制”斗争在实际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比如金权政治、削弱党内民主以及无谓的权力斗争,这些都暴露出“一党独大”体制在运转中自身存在的各种弊端。

### 2. “反体制”的社会大众运动

在“1955年体制”下,反对自民党的社会大众运动主要有两次大的政治运动:一是“反安保”运动;二是“住民”运动与革新自治体运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上台

的岸信介内阁在“维护法和秩序”的名义下,提出了《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最终“岸内阁”的这个法案在议会中被否决。这场社会大众运动的成功就成为“反安保”运动的先声。在岸信介内阁执政方针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使日本与美国结成更为牢固的同盟关系,放弃中立化的立场,并使日本再次走上军事化的道路。所以,从一开始《安保条约》的修改就遭到议会内革新党和议会外社会大众的反对。1959年3月,“阻止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国民议会”成立,早先成立的“反对《警察官职务执行法修改法案》国民议会”也加盟了这一新的组织,并共同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反安保”条约修改的统一行动。面对全国各地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集会和游行,岸内阁依然一意孤行,在国会中强行通过《新安保条约》,这一举动激起了全社会的公愤,引发了全国性大规模反政府抗议,“反安保”运动由此就转向了全民参与的反对自民党政府的民主运动。这场民主运动,最后虽然没形成对日本政治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新政治团体,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民党的统治体制,但它是战后民主化和现代化发展中成长起来的各种社会力量的集合,使不断涌现的市民阶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更加成熟,成为战后日本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

自民党在“反安保”运动之后把战略重点从政治转向经济,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社会开发计划”的引导下迎来高速经济成长,但是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日益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环境。1963年至1964年,三岛、沼津、清水的两市一町和横滨市的住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活权利,开展了反对“公害住民运动”并取得了成功,它不仅“使地方自治体就石油污染问题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也使中央政府开始就公害问题制定法律。”

<sup>[5](P138)</sup>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革新自治体运动也开始涌现。1963年3月,北九州市长选举,保守势力在选举中败北,社会党人首度当选,最初的“革新”市长诞生。同年4月,福岡、岩手和大部分的知事都由在野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大阪、横滨两大城市的市长都来自于革新政党。社会党系的飞鸟田一雄在就任横滨市市长的第二年,即1964年,成立了以全国社会党系的市长为中心的全国革新市长会,并成为革新自治体运动的领袖。到了20世纪60年代年代末,革新自治体运动波及到了日本中心地区——东京。在1967年和1971年的两次都道府县统一地方选举中,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推荐的候选人美浓部亮吉两次当选东京都知事,横滨的飞鸟

田一雄也第三次当选市长,共产党的黑田一当选大阪市市长,至此革新自治体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住民”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革新自治体运动虽没有像“反安保”运动那样激烈,但前后持续了十几年之久的这场运动,不论在规模、影响和社会效果上,都要比“反安保”运动来得深刻。据统计,“1973年,日本全国有3000个住民团体在活动,在革新自治体发展最盛的1974年和1975年,革新知事所辖地区人口占日本人口的39%,1964年成立的全国革新市长会到1974年发展到136个会员”<sup>[5](P139)</sup>。这一切都深刻地表明,“住民”运动和革新自治体运动是一个全国性的大众民主运动,对日本战后民主政治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对“一党独大”的政治统治构成了强烈的冲击。

### 3. 在野党与自民党的议会斗争

“1955年体制”初期,在议会中自民党遇到了以革新势力为主的在野的社会党的挑战和抗衡,社会党在国会中的议席数大体只是自民党的一半,这就形成了“自民党主导,社会党抗衡的态势”。<sup>[5](P105)</sup>1959年10月,因社会党左右两派间的矛盾和对立,以西尾末广为中心的社会党右派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于次年1月成立了民主社会党。“一党独大”下的两党格局就开始向多党化转变。1969年第32届众议院选举中,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败,损失三分之一的议席。相反,长期在议会中处于低迷状态的共产党和公明党在选举中同时跃进。这次选举在野党最后形成的格局是:“社会党拥有90个议席,公明党拥有47个议席,民社党拥有32个议席,共产党拥有14个议席”<sup>[5](P392)</sup>。至此,在野党多党化的格局完全确立。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自民党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保持不变。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野党多党化的格局有新的变化。1976年6月,以河野洋平为中心的部分党员脱离自民党,成立新自由俱乐部,这是保守势力合并以来的第一次公开分裂。同年底的第34届众议员选举中,该党有17人当选,最终拥有18个议席。1978年3月,社会党再度发生分裂,分裂出来的党员又成立了社会民主联合。这样国会中拥有议席的政党就发展到7个。至此自民党与在野党的力量对比也有所变化:1974年第10届参议员选举中,由于在野党的跃进,自民党在选举中失败,当选人数没有超过50%,从而在参议院形成了“朝野伯仲”的局面。1979年12月的第34届众议员选举中,自民党得票率跌到历史最低点,在511个当选名额中,只赢得249个,没有超过半数。后

从无党派的当选者中争取到一部分席位,才在国会拥有260个议席,勉强过半数。与自民党的境遇相反,在这次选举中,在野党在众议院中最终拥有245个议席,逼近半数,对执政的自民党构成强大的冲击,使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绝对优势不复存在,岌岌可危。这种冲击断断续续持续了近十年,1986年中曾根康弘为首的自民党在第38届众议院选举中大胜,才使这种局面得到有效缓解。然而好景不长,中曾根内阁在财政政策上没有信守诺言,违反公约,遭到国民激烈反对,不久就又陷入了新的危机。1987年底,中曾根将政权移交给竹下登,自民党也由此开始走向衰败。

无论是自民党内部的“反体制”运动和“反体制”的社会大众运动,还是在野党与自民党的议会斗争,都从不同的政治视域和社会层面对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政治统治构成了强烈的冲击,也为日后这种体制的崩溃埋下了政治基础。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一党独大”的体制终于被联合起来的在野党所取代。

#### 四、结语

萨托利认为,“主导党体制处于竞争性政党的边缘。”<sup>[7](P294)</sup>换句话说,“一党独大”制是竞争性政党体制的最低层次,民主的发育程度也不健全,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形式,与两党制相比不具有先进性。“一党独大”制退一步的话,很可能就成为非竞争性政党体制,也有走上独裁专制道路的可能性。

自民党“一党独大”执掌政权38年,党内的竞争机制是其最大的优势。党内竞争是党内民主政治的根本保证,党内派系的存在是党内竞争的根本前提。自民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是民主存在的行为方式,它区别于其他政党不透明的暗地角逐式的权力斗争,保证了党内民主的充分实现。对自民党而言,“派系的重要性超越政党。”<sup>[7](P138)</sup>公开化、透明化的竞争,也使党内各派系受到社会和舆论的监督,这样既能够保持和促进政党的发展,巩固执政地位。但是,党内竞争从根本上讲还是缺少有效监督和制衡,一旦政治能量释放完毕就归于常态,竞争优势不再显现。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崩溃,也是因为19世纪80年代后期自民党内部的竞争流于形式、名存实亡,党内派系关系表现为重协调轻对抗,实质意义上的党内竞争被制度化的人事分配所取代。从而导致自民党的体制僵化,缺少生机和活力,不能形成自我更新、自我监督的良性循环机制。在这种状态下,缺少竞争的“一党独大”体制进入崩溃状态就自然成为时间的变量,失去权力

就是一种客观的必然,失去权力的时点就完全取决于“反体制”运动的激烈程度,自民党在经过了一系列“反体制”运动的考验后,虽然支撑了38年,最终也跳不出这样的一个死穴。因此,保持政党活力的前提是要建立起不断更新、内外监督的机制。

从民主政治形式的合理性、制度发展的长远性来看,“一党独大”下党内竞争是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一种过渡性体制,虽不及两党制更具有民主政治的价值优势。但是,在现代社会,竞争不仅是衡量经济现代化的标准,也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的标准。自民党“一党独大”制为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竞争模式,即在“一党之内”形成公开化、透明化的竞争机制。然而,由于“一党独大”体制是对政党内部政治生活的一种高度的整合,就容易导致和形成政治体系的保守和僵化,造成体制缺少活力和动力,行政效率和能力的下降,也必然对经济社会问题会反映迟钝。19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步步衰落就表明日本政府对新的社会经济变化不能有效、快速的应对,最终导致了自民党“票田”的丧失。

应该看到,伴随日本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要求更加充分和迫切。只有充分的成熟的民主才能满足和容纳民众的这种政治需求。因此,在自民党“一党独大”体制运转了38年之后走向解体和崩溃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政党轮流执政的出现既符合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趋势,也是日本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大历史性进步。

#### 【参考文献】

- [1]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 [2]王振锁.自民党的兴衰——日本金权政治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 [3]李路曲.当代东亚政党政治的发展[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5.
- [4]朱艳圣.不寻常的民主——自民党单一政治统治与日本式民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5).
- [5]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 [6]李莹.日本战后保守政治体制研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 [7][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责任编辑 汪志强)